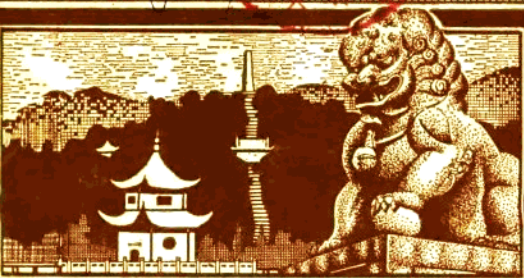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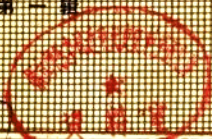


1703

革命文庫資料

第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廣東省圖書館革命文庫分館

前 言

襄樊市政协自1981年下半年建立文史资料工作组后，以“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为中心任务，坚持“存真、求实”、“实事求是”的方针，在政协委员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支持和热情赞助下，征集到大量珍贵资料。从1982年4月起，我们又以《襄樊文史资料征询稿》形式，先后选刊了二十多篇共十多万字文稿，分别送请某一时期、某一事件的当事人、知情者、熟悉内情的老同志，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校阅、核实、印证和补充，力求做到史实准确、中心突出、条理明晰、文字通畅。本辑所选载的各篇文章，以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在襄樊地区的建设和开展的统战工作、群众运动等资料为主线，辅以这一时期社会面貌的几个侧面资料，就是在《征询稿》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征得原作者意见后，几经修改，集体讨论定稿，汇集成书的。

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一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世的光荣任务。今后，我们将遵照全国政协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从人民政协这个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出发，进一步广征博采，精心编选，不断提高工作质量，以使政协委员和各方面人士共同耕耘的文史资料工作这块园地，枝叶繁茂，硕果累累，更好地为完成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缺乏经验，缺点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鄂西北建党初期的历史情况回忆·····	李 钟 (1)
震动鄂西北之二师学潮·····	刘鸣冈 (21)
大革命时期的鸿文中学·····	知 真整理 (29)
一九二六年襄阳驻军张联升部起义与叛变始末 ·····	陈涛石 (34)
关于私立樊城商业学校的回忆·····	张竹书 (41)
回忆私立樊城尚志小学·····	张竹书 (45)
关于在襄阳地下党工作的回忆·····	刘瑞芳 (50)
抗战时期党在鄂西北恢复和发展的概况 ·····	王之铮撰 李 钟校 (56)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襄樊·····	肖 肃 (80)
洪深剧团来到襄樊·····	茹久平 (85)
播种襄阳城·····	曾霞初 (89)
抗宣三队战斗在襄樊·····	郑含华 (96)
第二文化队的回忆·····	李 钟 (115)
我所知道的田润民烈士·····	王之铮 (123)
王之瑜烈士生平事略 ·····	伏生搜集整理 大林补充修改 (129)
怀念廖挺烈士·····	李钟 王之铮 (137)
“桃色”将军——陈离·····	徐 蓬 (142)
襄樊码头概况·····	张光耀 (166)
襄阳民众电厂的兴衰·····	陈涛石 (169)
熊临丰药店解放前发家情况 ·····	熊家鼎口述 邱祥林执笔 (173)

鄂西北建党初期的历史情况回忆

前 记

李实同志，原名李抱一，襄阳县东津湾人。一九八〇年五月，在他七十八岁高龄时，专程回到襄阳，向我们讲述了几段鄂西北革命历史。我把当时的笔记整理了一个草稿，于八一年十二月交李实同志审阅。李实同志在八二年元月十四日来信中，除认为此稿有些粗糙外，未提出其他意见。其中，“二师学潮”一节，由于刘鸣冈同志已撰文详述，故略去这一部分。

李 钟

“五四运动”在襄阳

“五四”革命运动，给鄂西北建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但消息传到襄阳，已经是五月中旬。因为襄阳交通不便，京、津的报纸送到襄阳总得一周时间。学生们知道了“凡尔赛和约”和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后，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以第二师范、鸿文中学的学生为主，掀起了反帝救国高潮。学生们很快自发地走上了街头。他们主要的活动是查禁仇货，所谓仇货，便是日本进口的洋布、羽绫、洋火……。当时主要目标集中在樊城最大的匹头店“彭源昌”等字号，而这些字号多

系黄帮经营（所谓“黄帮”，即黄州人的同乡帮会，在樊城有“大黄州会馆”“小黄州会馆”）。学生加上被动员起来的店员、市民，在樊城四官殿①开大会，到会的约万余人，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大集会。大会的主席是管治才②，系鸿文的学生，白家湾人。他在台上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反对二十一条。他咬破手指，当场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人们激动得泣不成声。大会以后，群众在樊城游行示威。游行之后，学生们进一步地查禁仇货。这时市民群众政治觉悟有了提高，许多店员向学生报告仇货隐藏在什么地方，并且查明了有大批仇货从汉口运往这里，载运货物的是木船，沿襄河而上。这一批大木船约二百余只，满载着运往襄樊、老河口，豫西南和陕西等地的各种货物。学生们探明消息后，立刻派人沿襄河而下，在刘家集截住这批船只。他们向船工做了一些工作，发动了船工，将船只拖到襄阳东北角长门河下停泊。那时阊门外的襄河上，有一片大沙滩。人们把船上的仇货运到沙滩上，全部抖开堆积。两百多条大船的货物被堆在沙滩上，尤如小山一般。货物上面被学生们淋上煤油，大烧特烧，一连烧了几天几夜。——在“五四”运动时期，这样大量焚烧仇货的行动，在全国是少见的。

在襄樊，学生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奸商。以奸商为主的商业组织机构是商会。焚烧仇货，大大地触犯了奸商的利益，所以，当学生再次集合千余人游行时，樊城商会便动手捉了三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孙孝承。他们把三个学生捉去毒打，以泄心头之恨。学生更不示弱，迅速聚集到商会门前，也捉了商会里三个人，把他们带到钟鼓楼（昭明台）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从商会捉来的三个人被我们吊了起来，用花栗木柴棒狠揍。打得这几个人呼天喊地，叫爹叫妈。

商会没有办法，便找到襄鄖镇守使张联升、道尹熊斌。这两个地方大员便带上卫兵，亲自到钟鼓楼上与学生谈判。这时学生们一边与之谈判，一边把商会的人打得更起劲。两个大员迫于学生的威力；当场答应了三个条件：1、商会要放回三个被捉的学生，向学联赔礼道歉，并具结再不贩卖仇货；2、礼送被捉去的学生，送回时要放鞭炮——从樊城商会一直放到钟鼓楼；3、被打的学生，由商会负责送到医院养伤，费用由商会担负，商会保证不与学生为仇，不与查禁仇货的行动为难。镇守使和道尹马上在条件书上签了字，学生们才放了商会的人。

这一运动，不仅对城市震动很大，对农村也发生了一定影响。学生们开始知道了向农村开展宣传活动的重要。有一个叫董曦轡的学生，曾编写了个“文明戏”的剧本《五分钟》。剧本的内容是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侵略；鼓舞群众进行斗争，坚决打倒帝国主义，不要只有五分钟的爱国热情。学生们分途到乡村去演戏、宣传，提高了农民的觉悟。尽管这次运动并没有大发动农民参加，但是这些活动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农民运动的开展不无影响。

“五四”运动，在鄂西北是以襄樊为中心开展的。这一运动搞得剧烈、普遍，时间持续也较久。运动提高和培养了学生们的斗争勇气和斗争艺术，也锻炼了一部分干部。这为我党在鄂西北开展革命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肖楚女第一次到二师

肖楚女，1893年生于汉阳鹦鹉洲。他自幼家贫没上过学，母子二人靠在鹦鹉洲拾废木材为生（当时鹦鹉洲为湘赣运到湖北的木材集散地，树皮废材多）。在他稍大时（十三

岁)，便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后来又在一 家茶 馆里“跑堂”。那时学徒和“跑堂”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深受老板压迫。当他干不下去时，便到一只轮船的伙房里打杂。在轮船上，跑了不少码头，见识逐渐广了，这时他便在空余时间开始认字自学。肖的幼年时的一段生活，与俄国文学家高尔基颇为相似。

十六岁他当了兵。在兵营内和他在一个“棚”③里的同事中，有个姓郑④的黄安县人，曾中过秀才，也曾是“文学社”⑤里的社员。此人见肖楚女很聪明，便和他要好，系统地教他一些文化知识。二次革命⑥失败后，郑便向他谈，我们当兵是为了救国救民，现在又出了个袁世凯，当兵再没干头了。

当时，知识界思想混乱，怎样救国？众说纷纭。其中“实业救国”的思潮兴起，武昌设立了一个蚕桑学校。郑当时便动员肖去投考这个学校。肖楚女两榜得中，便进入了这个学校。肖一进校，不专心学习蚕桑，而是利用这个学习环境，如饥似渴地博览各种报章杂志，眼界大开。

肖楚女善于演讲，他讲起话来态度自然，声音铿锵，逻辑严密，鼓动性强，简直每句话都能打动听众的心弦。我们党的同志，都认为恽代英同志善于演讲，但肖和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蚕桑学校毕业典礼大会上，校长为了发表演说，曾聚集黄州在武汉的博学之士共拟了个讲稿，这应该是惊人之作吧。但当肖楚女代表学生致答词时，言词动人，大惊四座，校长的杰作，相比之下就显得黯然无光了。毕业之后，肖便从事撰稿。恽代英同志是中华大学附中的主任，（1915—1916）二人结为好友，肖便从恽代英那里，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肖楚女同志是1920年8月来到襄阳二师的，九月在开学典礼时，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他生着麻子，眼睛深度近视，一身打扮，象个乡下佬。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他在襄阳第一次播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子；就是他，在短短的时间里，与广大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肖楚女同志在二师向学生们系统地讲解了许多社会科学知识。他讲了诸如费边、欧文、工团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日本的新村学说等等，并对其一一加以批驳。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讲授了社会发展史……启发了学生的思想，打开了学生的眼界。他教国文课，选的课文多与政治有关，曾选讲鲁迅的《狂人日记》《风波》等文章。在1920年他就认定鲁迅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家，这种见解是何等惊人！

肖楚女同志在襄阳二师不仅教书，更重要的在于“教人”。他除了在课堂上“言传”外，主要是“身教”，带领学生参加一些实际活动。除正课外，他在每星期日还举办时事讲座，吸收不少学生听讲。课余时间，深入学生中间，一同散步谈心。这里，我们可举几件突出的事例：

俄国侵略我国很早，自清代开始，便与我国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主张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在此以前，中俄是有外交关系的，自十月革命以后，中俄便断交了。促使中国与革命后的俄国复交，以促进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当时是件革命行动。肖楚女同志，教育学生认识苏维埃，了解布尔塞维克，他介绍大家读瞿秋白翻译的《赤都新史》《俄国劳农政府》等，他领导学生通电北洋政府，促进中俄复交。

在肖来之前，学生曾有个松散的“学生会”组织。肖带

领学生，改“学生会”为“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章程是肖拟的。后来又进一步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会”，章程也是肖拟的。反对旧的教育制度，是自治会的任务之一。自治会的会长为阎平阶，二任为刘子谷。

肖楚女对多数教师注意做争取团结工作，对意识形态不同的教师也是从斗争中求团结。以对杨立生的争取为例：

当时襄阳有三杨：杨立生、杨君漠、杨君盘，人称“三杨（阳）开泰”。还有三怪：马岐山、庞俊山、杨立生。其中马岐山，住在襄阳玉皇阁，不做任何人的官，爱写状子，专打抱不平。杨君盘是旧民主革命的幸存者，是二十个县的总绅士，影响很大。如天主教大司铎（鄂西北主教）车格里，襄阳道尹都买他的账，一张名片投进，便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杨君漠，没有什么学问，但能驾驭张联升、雷韵午之类的要人。至于杨立生，既是“三杨”，又属“三怪”，他是三杨中摇鹅毛扇子的人物。

杨立生，十三岁上考了秀才，家中贫穷，长大后他得了个生财之道的秘密。当时赌博盛行，输赢最大的要属“摇单双”（即“摇宝”），他能从骰子在碗内脆疲声中，悟出单和双的规律，于是他在赌场中大发横财。顶峰时，他开过十个钱庄，置了三百多亩田地。辛亥革命后，他的眼光有不同的变化，收缩营业，把钱庄收缩为两个。他用很多钱大买字贴、书画，几间屋子堆得满满的。“五四”以后，看到社会的大变动，再不置田买地，而专心钻研医学，后来简直成了妙手。另外，他还练了一笔好字。

就是这个杨立生，他在二师执教时，由于研究过老庄，又笃信佛教，所以在课堂上大讲《庄子》，是一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肖楚女常同杨立生进行辩论，以辩证唯物论，批驳

杨的唯心论。辩论之声，室外可闻。从此，我们才知道什么叫辩证唯物主义。辩论一结束，教师间仍然谈笑风生，毫无敌意。到后来，这位唯心主义的大绅士“学者”，也竟然学起马列来了。以后数年，杨曾掩护过革命同志，替革命同志治过病，称得上是革命的同情者。最突出的例子是：在肖楚女二次离开襄阳时，杨立生竟然捐二十元大洋给《中国青年》。为此，恽代英同志于1925年5月26日亲笔写信给杨立生，认为他是有识之士，要多做工作，团结起来，救国救民（原信已交中央文物部门）。从以上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肖楚女同志对与自己立场观点不同的人是如何耐心争取，如何从斗争中团结他们。

1921年二师换了校长，原来的有民族思想的天门人刘泥青被换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肖楚女也不能再教下去了。夏天，他便离开了襄阳。

建党初期

鄂西北建党，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缺乏工农基础。以襄樊而言，这里无工厂，只有零星的小工业，工人也很少，如皮箱工人、卷烟工人等。此外便是码头工人、城市贫民和为数较多的店员。

“五卅”运动后，这里开始发展党的组织，最早是谢远定负责，他是枣阳南王城人，是1924年党派到鹿门中学任教务主任的。25年开始入党的多系鹿门中学的学生，如高如松、焦如松、宋良猷等。晚一些的有鸿文的马游，再晚有董曦簪等。谢远定开始对二师不了解，后来经肖楚女同志介绍情况，相继发展了方福生、燕明轩、孙孝承等人。我是25年在武昌入党的，而左觉农（即左泽民）是在汉阳入党

的。

1925年底，武汉地委⑦派我回襄阳，回来的主要任务是反北洋政府的盐税加价和码头捐。回来后见到谢远定，才知道这里的组织是“特支”。但是这个特支没有干事会⑧，仅谢一个人领导特支，他留我接他的工作。十二月，他没作详细交待就到广州去了。

这个特支领导襄阳、郧阳、荆门地区。以后我根据武汉地委指示，在这里发展了四十多个共青团员。再一个任务是发展国民党。我便成了这一带的国民党创始人。两个月后我们发展国民党党员三百多名，成立了襄阳县党部。当时董老是湖北国民党的常委。我把情况向董老报告后，董老派石炳乾为特派员，指导我们的工作。起草宣言、决议都由我来干。准备好后，便在十字架山⑨下一间破屋里开代表会。到会代表约七、八十人，选我当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委。为什么要成立国民党呢？当时是国共合作，我们党的指示，让一些党员加入国民党，在里面发展工农和知识分子，从而改造国民党。

不久，我们又召开了共青团的全体会。会址在邓城（樊城北乡）董振同志家的稻场里，到会约四、五十人。在会上通过了决议。本来派来的姓李的同志让高如松负责团的工作，可高不干。选举时，一致选到了我的头上。会上成立了共青团襄阳地委，我任书记，宣传部长高如松。

这时党的干事会也成立了，我的书记，组织干事宋良猷，宣传干事姚召德，统战干事孙孝承。可是组织生活怎么过，谁也不大清楚，只从理论上知道一点点。开起会来，一、主席报告，二、国际形势，三、国内形势，四、地方工作任务。然后大家发言讨论。这差不多是开会时不可改变的

模式。方针和任务的依据，一是靠上级派来人指示，再是依靠党报和团刊《中国青年》。地方报纸有武汉市委的《楚光日报》。那时把地下党的工作神秘化，开会时找绝对秘密的地点，诸如习家池、张公祠、狮子楼。

乐群书店

当时，我们党常利用两种形式进行宣传工作。一种是办学校，例如上海党便办了上海大学，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都在那里当过教授，培养了不少党的骨干。他们所编的讲义，只要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另一种开书店，上海开有上海书店，广州也有出版社，在华东和华南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6年，我们在襄阳北街也开了个书店，名叫“乐群书店”。当时开书店，没有政治后台是不行的。我们利用一个四川人在光化开的乐群书店之名，在襄阳搞了个分店。书店资金是招股而来，两百铜钱一股，一共集了两百多元的股金。这个书店，大量发行《楚光日报》《武汉评论》《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并销售孙中山的书籍。书店门面很小，但它在鄂西北的宣传工作方面，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输送干部和建立党的组织

1926年，我接受特支工作后，第一步是发展、教育培养党员；第二步便是向外输送党团员，送到外县工作，送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大量输出的同志们中，有焦如松、李少堂、王全之、崔大全、方福升（方旭初）；房县人李明铨、毛定方、王均斋；光化人程钦；荆州人杨叙贤、杜永寿；均县人尹乾山等等。

这时，鄂西北各县的建党活动开始了。

左觉农是25年12月回光化工作的，他与特支发生关系，是特支派出的“通讯员”（三个党员可成立支部，一个或两个党员单独活动的称“通讯员”）。

1926年暑假，一大批同志分赴各县建党。其中枣阳人最多（学潮时，也是枣阳人多）。襄阳县和枣阳县正式建党同在1926年8月。枣阳第一位书记是程克纯，组织部长付良居，宣传部长王耿平。襄阳县的第一位书记是马游。

这时从南京、武汉也陆续回来了一些党团员，其中如赫季毅。26年暑假前他在白水中学当教师，以中学为基地发展党，但成绩不显著，直到二师学生暑假回乡时才有大发展。宜城原无党团员，这时从省农讲所回来了一个原附小的学生胡天经，党派他回宜城工作，他可说是宜城县的第一个党员。

鄂西北的建党工作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能深入到农民中去。在城市（主要是襄樊）当大革命的浪潮卷来时，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店员中进行活动。1926年的青年联合会主要的成员是店员，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一天一夜间全城都唱起了《国民革命歌》和《少年先锋歌》。震撼世界的大革命运动，也曾在这个偏僻的鄂西北城镇掀起了一阵浪潮。

在襄阳，当时仅发展了一个农民党员。这位同志叫李端成，是东津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懂得一点“三民主义”，后来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加入了党（1927年牺牲）。

那时我们只有少数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另外还有不少的国民党员。特支开会让大家到农村发展国民党员，以改变国民党的成分。工作要数枣阳和襄东黄龙岗一带做得好些。襄

阳对这一工作做得不踏实，马游同志知识分子气太重，没有抓起农民。

大革命失败和武装斗争

北伐军打到武昌时，张联升便投降了革命军。当蒋介石“四·一二”叛变以后，湖北的夏斗寅等接着叛变，张联升也随着于五月下旬背叛了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原来成立的青联、农协等组织均垮了，党团组织都不能进行公开活动而转入到地下。

董振同志这时被反动派杀害。他是我们襄阳地区第一个被杀害的烈士。

在谈鄂西北的武装斗争之前，先要介绍一下程克纯同志^⑩。程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法国参加党。他身材高大，平时语言不多，可是说了就做到。他对马列主义有一定的研究，对资本主义也了解得较深。在党内他早对陈独秀有意见，说陈是个糊涂家伙。他在鄂西北建党初期回到了家乡一枣阳，主要任务是领导群众抗捐抗税。因为他对地方情况不熟，没大量地发展党员。程克纯最大的功绩，是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前，他就千方百计地弄钱，到武汉买了十二支盒子枪（即驳壳短枪）。当时国共没有分裂，他就用这十二支枪和豪绅地主斗争，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是以枣阳为中心展开的。客观条件是：鄂西北驻军是杂牌军，驻扎在襄阳城内的是西北军方振武，还有岳维俊。西北军反动程度稍次于蒋桂军阀。他们固然也杀害了董振、李端成同志，但比之江浙、两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暴行差得多了。枣阳驻军更是杂

牌中的杂牌。驻那里的师长叫李济才，是樊宗秀的建国军的一个师。所谓建国军，是豫西土匪头子组织的一个部队，反对过军阀，受到孙中山的表扬而取名为建国军。

枣阳县里的党组织力量强，能与农民结合，所以武装斗争开展得好。枣阳的武装部队名称是“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部”。总队长是程克纯，我（李抱一）曾作过总队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后，枣阳的一些曾加入过党团的大少爷们，也不能不搞武装斗争。其中如王承祜，便是一个打枪百发百中的战将。这儿，很快地发展到二百余支长枪，二、三十支盒子枪的武装（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的武装，影响扩大到唐、桐、泌）。

这支武装在枣阳一带异常活跃，但它却有一些缺点：他们以保卫家乡为主，不放大活动的圈子，总是在蔡杨铺、锯家湾一带活动，敌人力量一强大，他们就把枪“插”起来，环境好些，又拉出来再干，使敌人无法捉摸。

程克纯领导武装斗争后，枣阳县委书记便交给陈雪怀。当时县委里的成员付良居，他能说会道，很嫉妒程克纯。程又不善于团结人，个性很强，总把别人当小孩儿看待。这样，尽管他领导下的几位队长，多是黄埔四期的学生，也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1930年，这支武装进行了改组。改组之前，中央就派了崔大全任总队长，当时马游在总队任党代表。崔大全作战英勇，如同猛虎，但不幸当了半年总队长便牺牲了。崔一死，马游也离开了部队^①。这时，一位叫杨秀谦的同志把武装领导起来。杨秀谦很热情，但不会打游击，完全用正规战的打法，硬打硬拚，不久也牺牲了。枣阳还有一个余益庵，

他的名字远没有他的绰号——余聋子出名。他原是私塾教书先生。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搞到一二百条枪，但常常受到损失而流亡出根据地。当他只剩下几十条枪时，跑到了洪湖。贺龙同志帮助他两百支枪又打回来，后来又搞光了，再次到洪湖时，看到那里搞“肃反”，才又返回。他搞游击队，真称得上几起几落。

与襄枣边武装斗争兴起的同时，随县唐王店一带的农民也有一部分武装起来了。我在随县当书记时，只有二十几条枪，后来也有所发展。

谷城在1928年也有过暴动，那是以封建会道门形式出现的，称之为“大刀会”。他们念咒语，吞硃砂符，手持冷兵器与地主武装搏斗，高潮时，曾发展到一两万人。

均县一个叫李大刚的同志，也组织了一部分武装，并联合了一些土匪，进行斗争。斗争失败时，恰逢贺龙路过房县，给予支持，但不久又告失败，那一带牺牲了不少的人。

袁树堂暴动失利

袁树堂是光化县袁冲人。袁家是所谓的“书香人家”。他的父兄均为秀才。袁树堂年幼时受到孙中山学说的影响，有民主思想。他在家竟然把司命神——灶王爷的神龛毁掉，并且坚决反对缠脚，致使他的外甥女儿、侄女儿无一缠脚的。他又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革命先从他家里革起。他还有个可贵之处是懂得掌握武装的意义，辛亥革命时，他跑到武汉当警察。在旧时代，当警察是受人轻视的狗腿子。象他出自绅士之家的人当警察，当然引起家中一场轩然大波。袁到武汉后接触到了一些政治，相信实业救国的主张，在武汉办了个手工工厂。

左觉农同志是在他家长大的，也是受到他的一些民主思想影响而逐渐走向革命的。

袁又把他的侄女、外甥女带到武汉念书。大侄女袁溥之“五四”运动前，在湖北师范闹学潮被开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是省妇协主席，为湖北妇女运动第一个领袖（袁溥之，陈郁同志的夫人，现为广东省高教厅顾问）。二侄女袁震之是吴晗同志的夫人⑫。

侄女们进步了，他的思想也不能永远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在侄女们的影响下，袁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当时陈独秀特许他以国民党的身分去当县长。首先，他到了蒲圻。武汉市委指示他开展农民运动。“四·一二”后，杨森、夏斗寅等叛变，他被调到武昌县。革命危急关头，又调他到黄陂县任县长。这时黄陂县内，关押了几百名党员和农民领袖。袁接受了党的任务，大开狱门和城门放走了这些同志。接着他化妆到了汉口，由于身分暴露，只好派他回光化。

袁树堂回到光化后，以他家庭地位作掩护，他那里便成为鄂西北党、豫西南特委的联络点。1930年袁掌握了五六百条枪，计划在光化武装起义，影响鄂北数县。可是在起义的前夕，他的堂兄告了密，光化反动阶级派人在他家小客房内把他击毙，这次共死了四人。这样一来，光、襄、枣等六县的武装暴动的计划失败了。

付良居叛变，鄂西北党组织遭到破坏

1930年，原在枣阳县的付良居当了鄂北特委的组织部长。此人对地方党的各级组织很熟悉，记忆能力特别强。他在被国民党反动派捕获后叛变了。他的叛变，使得鄂西北的地下党遭到彻底的摧残。当时反动军阀师长范石生住襄阳，